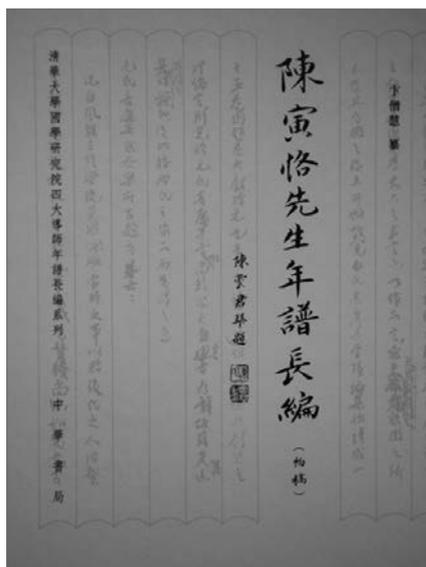


# 「何必舊」與「何必新」

## ——評卞僧慧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 段 煉

卞僧慧所編纂四十五萬字《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蒐羅材料洋洋大觀，部分為新增的史料片斷，是廣受學界推重的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有益擴充。



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卞僧慧所編纂四十五萬字《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年譜長編》），引用只註頁碼），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年譜長編系列」之一種。全書共分八

卷：卷一係「世譜」，詳述江州義門陳氏家族；卷二從譜主陳寅恪出生至其赴美留學前夕（1890-1918）；卷三始於陳氏留美至與唐筼結婚（1919-1928）；卷四自梁啟超病逝陳氏送其入殮至抗戰爆發之後隨清華大學遷至長沙（1929-1937）；卷五自陳氏一家經香港轉赴西南聯大至國共內戰之際離開北平（1938-1948）；卷六自陳氏抵廣州嶺南大學至中共中央在京召開「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會議（1949-1956）；卷七自「整風運動」至陳氏夫婦逝世（1957-1969）；卷八係「後譜」，蒐集與陳氏相關之人事及學術動態（1970-2003）。另外，《年譜長編》尚有「附錄」兩組：一組為陳氏當年開課筆記三種；一組為卞僧慧所撰關於陳氏為學為人的舊作五篇。

作為習見史料之一種，就體例而言，年譜大多以譜主一生時序為脈絡，鉅細靡遺地蒐集散見於文集、書信、日記、報刊以及他人憶述的相關材料，力圖為譜主提供一

份詳實完整的人生記錄。因此，年譜的價值首在編纂者對於新舊史料「竭澤而漁」的發掘整合與資料鋪排的精確細緻。文字的生動有趣與論述的自出機杼，反而是其餘事。就此而論，《年譜長編》蒐羅材料洋洋大觀，其內容足稱豐贍。部分新增的史料片斷，讀來親切有味，實為廣受學界推重的蔣天樞（蔣秉南）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sup>①</sup>的有益擴充。

比如，陳寅恪自幼嗜學，博覽群書，然「猶未能自信」。據卞僧慧記述，1936年前後，陳氏上課時曾言，當年（時日不詳）「嘗取清康熙、乾隆兩朝詞科試題自驗。康熙朝題全能完成，乾隆朝題於《天地五六之中合賦》則為之擱筆」，稱「命題之微，亦通於政事」（頁55）。《年譜長編》另收入卞僧慧回憶一則，1931年「九一八事變」與1937年「七七事變」之間，國內一度掀起所謂「讀書運動」，報端刊登文章開列書目者頗有其人：「有一次先生謂：『於《太上感應篇》、《封神榜》、《近思錄》三書，能透徹了解，亦可謂對中國文化有了了解。』」（頁257）。又如，《年譜長編》轉引「國家主義派」代表人物李璜晚年回憶，稱1922年曾與陳寅恪、曾琦、宗白華、俞大維等人在德國晤談。陳氏「酒酣耳熱，頓露激昂。我親見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故李璜感歎，近年紀念陳氏大抵集中於其學問，「而甚少提及其對國家民族愛護之深與其本於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惡之切」（頁79）。

另外，《年譜長編》徵引戴家祥致蔣天樞長信甚詳，廓清1927年

清華大學延聘章太炎任國學研究院導師一事未果，實非後人所傳因章本人拒絕，而是清華校長嚴鶴齡表示「有困難」，故「校部始終沒有同意」（頁104）。陳寅恪也曾告訴戴家祥：「有人不同意〔延聘章太炎〕。太炎不像靜安先生〔王國維〕，脾氣不好，人家有點怕他。」（頁103）戴家祥致蔣天樞信中，亦回憶當日有人祝賀陳寅恪任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陳氏回以一聯「訓蒙不足，養老有餘」，從中可見先生的風趣與彼時的心情。據戴家祥解釋，上聯是指教同學初學梵文的困難程度，下聯是指陳氏自感還處在年富力強的有為時期（頁101）。《年譜長編》中此類憶述，皆如吉光片羽，彌足珍貴，譜主的風采亦隨之躍然紙上。

如論者所言，《年譜長編》亦偶有缺漏且尚存「懸案」未解，比如，中共建政之後，陳寅恪「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等要求，既已為周恩來首肯，何以最終仍舊未能北上任職<sup>②</sup>。此外，少數史實自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出版之後已有相關文獻補正，然而《年譜長編》未能及時採納。比如，關於陳寅恪自歐洲歸國的具體日期，《吳宓日記》1925年11月30日所記載「陳寅恪來函，歸期展緩」<sup>③</sup>，即未被《年譜長編》收入。又據陳寅恪長女陳流求致《年譜長編》編纂者函，《年譜長編》認定「是年〔1926年〕，先生自歐洲經海道歸國」，「時間未詳」（頁91）；實則已有論者據羅家倫1926年1月5日致其女友張維楨書信初步考訂，大致係陳氏因「歸期展緩」，在歐洲逗

《年譜長編》收錄陳寅恪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以及陳寅恪少年時期史料堪稱詳實，讀者正可藉此一探戊戌前後湖南社會新舊交錯的思想脈動，重新回望百年前發生於湖南長沙的歷史迷局。

《年譜》呈現的戊戌前後湖南史事，實非習見的「新舊之爭」，反而是「新舊之間」的人事糾葛和緊張心態。「新」與「舊」相互拉鋸，「新派」未必全然趨新，「舊派」也不一定極端守舊。

留到1926年1月返國(從馬賽登船)，2月抵滬<sup>④</sup>。

誠然，《年譜長編》較之過往記錄頗有擴充，然與譜主無直接關聯之史料亦不免羈入，如湯用彤、錢穆、俞平伯、梁漱溟談熊十力事(頁111-12)，吳宓與毛彥文之戀愛糾葛(頁164-66)、季羨林論胡適(頁248)、龍雲之擁共聲明(頁258)等，似嫌離題。然而，小疵不掩大醇，《年譜長編》足資關切陳寅恪及其時代的研究者與愛好者參考研思。

陳寅恪出生於長沙通泰街周氏蛻園，童年時代曾在長沙又一村巡撫衙門小住。其父祖輩正是湖南維新時期運籌帷幄、立意革故鼎新的風雲人物陳寶箴、陳三立。從時務學堂到戊戌政變，晚清湖南成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舞台。然而，維新運動是「帝黨」與「后黨」的宮廷博弈，還是「革命派」與「保守派」的激烈廝殺，抑或是一場「不徹底」的「階級鬥爭」？時代不同，評述迥異。除當事人(如梁啟超)相關憶述作為史料佐證之外，過往研究者對於戊戌湖南的社會歷史也多有矚目，成果蔚為大觀。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當中，思想史家張灝所撰「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一章，即闢專節論述「湖南的維新運動」<sup>⑤</sup>。又如日本學者小野川秀美在其《晚清政治思想研究》一書中亦有「戊戌變法與湖南省」專章細緻討論<sup>⑥</sup>。另如湯志鈞、黃彰健、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張朋園、汪榮祖、羅志田、王爾敏、茅海建等中外學者，針對戊戌前後湖南變局的內外動因，皆有研究，足以啟人心智<sup>⑦</sup>。

《年譜長編》收錄陳寅恪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以及陳寅恪少年時期史料堪稱詳實，讀者正可藉此一探戊戌前後湖南社會新舊交錯的思想脈動，重新回望百年前發生於湖南長沙的歷史迷局。如譜主所言：「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馬或班，皆不必計也。」(頁113)就筆者而言，《年譜長編》引人入勝之處，端在於其中呈現的戊戌前後湖南史事，實非後世班馬所輕率裁斷且為往日教科書中習見的「新舊之爭」，反而是「新舊之間」的人事糾葛和緊張心態。無論從時序更替抑或階層互動而言，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此刻為舊、彼時翻新的斷裂與連續，使得湖南維新運動在短短數年間風起雲湧，「新」與「舊」相互拉鋸，成為當時互相界定的一對變量——「新派」未必全然趨新，「舊派」也不一定極端守舊。彼時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更是審時度勢，試圖藉助變革的「頂層設計」與細節掌控，爭奪維新運動合法性論述的主導權。十九世紀末期，在湖南這方舞台之上，新舊之間的權勢消長與重心轉移，折射出戊戌前後時局的錯綜複雜與知識份子心態的敏感微妙。今日讀者展閱《年譜長編》之時，或許可以稍稍擺脫後見之明，關注往昔論斷不曾注意的「燈下黑影」。

## 一 「舊派」的新：《時務報》「不可不看」

據過往學界研究，十九世紀末期湖南維新運動的興起，一方面與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潰敗於日本的刺激直接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社會的兩大變化密切相連：其一是1860年代以來，因對抗叛亂與發展洋務，督撫權力的不斷擴張；其二是隨着同時期地方士紳政治地位的提升，他們對於社會事務的積極參與。同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對於維新大業的開放包容、開明士紳具體操盤湖南內政，多重力量集中發酵，成就維新之初湖南政府與士紳集體「趨新」的「共同事業」——此亦有助理解湖南的寶善成製造公司、輪船公司與時務學堂，為何皆由同一批人發起。

以時任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王益梧）為例，在當時新派與後來的主流歷史敘述中，他與版本學家葉德輝被籠統視為同屬「詆訾新政」的舊派代表。然而，湖南變法初起時，王反而是極力主張學生閱讀維新報刊的人物。1897年1月，作為維新重鎮之一的時務學堂，即由王申請成立並馬上獲得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批准。與此同時，上海《時務報》刊有〈嶽麓院長王益梧祭酒購《時務報》發給諸生公閱手諭〉，對於《時務報》揄揚有加：「查近今上海刻有《時務報》，議論精審，體裁整飭，並隨時恭錄諭旨暨奏疏，西報尤切要者。洵足開廣見聞，啟發志意，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頁38-39）時務學堂提調熊希齡注意到，彼時延聘梁啟超主講時務學

堂，亦得到從省會政界到地方士紳一致「贊成」與「稱美」。當年10月，梁啟超初到長沙，「賓客盈門，款待優渥，學堂公宴」。而且，「王益梧師、張雨珊並謂須特加熱鬧，議於曾忠襄祠張宴唱戲，晉請各紳以陪之，其禮貌可謂周矣」<sup>⑧</sup>。

連請人唱戲、設宴作陪這樣的細節都已考慮妥當，可見維新初期，新舊人物之間的敵對情緒，顯然不及後來歷史敘述那樣誇張。之後情勢發展，假設真如《時報》創辦人狄楚青後來回憶的那樣，「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sup>⑨</sup>，以致於「新舊之爭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sup>⑩</sup>，那麼，反觀變法初起，梁啟超禮數周全地將「學規課程應讀何書，應習何學」定下條目，「送交各官、各紳，互相傳觀，群以為可行」<sup>⑪</sup>，則堪稱耐人尋味的前後對照。而在當時「以為可行」的人群當中，或許就有主張「特加熱鬧」歡迎梁啟超，並陪他一起飲宴看戲的王先謙。

其實，當時新派人士也認為，戊戌前夕湖南維新氛圍並不算壞。這與事後追憶中湖南「頑固守舊」的印象其實頗有距離。清末文學家范當世在為陳寶箴撰寫的〈故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墓誌銘〉中，雖然着意刻畫「頑者」（舊派）對於陳寶箴的誹謗和政變後「中立者」的轉向，但也強調陳氏在湖南主持變法時，「湘之人興起者太半，其頑者一二，中立審勢者裁二三而已」（頁9）。而對於湖南維新的失敗，在梁啟超的回憶當中，卻被歸結為「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嘩，群起

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在當時新派與後來的主流歷史敘述中，被視為「詆訾新政」的舊派代表。然而，湖南變法初起時，王反而是極力主張學生閱讀維新報刊的人物。

倚之」<sup>⑫</sup>。既然「頑者」不過寥寥一二，而且對於維新之舉一度釋放善意，為何戊戌年湖南變法的情勢，最終發展到連「中立審勢者」都「群起倚之」的程度？其中新舊交錯的歷史細節，實在值得後人再思。

## 二 「新派」的舊：「康黨」、 「舊派」與「誰氏黨」

與舊派面目「既新且舊」相對，當日立意維新的新派想法卻未必一體全新。與舊派人士喜迎梁啟超入湘的態度相映成趣，新派最初略嫌保守的心態同樣值得揣摩。據小野川秀美的研究，維新代表之一、湖南學政江標治下的校經書院所辦《湘學報》，最初不涉經學，實有意迴避「於時事有裨」，然「言之未免過激」的「素王改制之說」。變法初起，江標雖與康有為一樣，力主透過經書吸納西學（「復古周禮，更新西學」），但是江標標榜周官即「周禮」，與康有為斷定「周禮」為偽書的態度顯然不同。而到了張之洞嚴辭斥責《湘報》上易孺的激烈文字之時，在維新派內部，黃遵憲亦認為易孺的態度確實「足以驚世駭俗而宜戒之」<sup>⑬</sup>。不過，隨着湖南維新的激進化轉變，無論江標還是徐仁鑄、唐才常，當日湖南維新人士的學術態度，大體都從主張調和漢宋、今古折中、「中體西用」的穩健態度，轉向由康有為首倡、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竭力鼓吹的今文經學。

彼時陳寶箴亦因力薦後來成為「戊戌六君子」的楊銳、劉光第，

「人遂洶洶，目公以康黨」（頁8）。維新人士之一、南學會會長皮錫瑞在日記中記載，當日學正張百熙保薦二人，首為康有為，次即陳三立<sup>⑭</sup>。由此可知，在當時人眼中，就「力主變革」而言，陳寶箴父子與康有為實可同樣劃為趨新人物。「康黨」一語作為刻畫新派人物的關鍵詞頻頻出現，其實是值得注意的時代現象。然而，被世人「目為康黨」的陳寶箴，卻不認為自己屬於「康黨」，反而着力劃清界限，其背後的心態則又值得揣摩。據范當世所述，當光緒召見康有為之時，陳寶箴上疏「言其短長，推其疵弊」，甚至力主「燬其所著書曰《孔子改制考》者」，這樣的言行大概和後人心目中的舊派，已經相去不遠。後來，「湖南既設時務學堂，其官紳並緣《時務報》推梁啟超為主講而公〔陳寶箴〕從之」。細玩文字，陳氏對於新政「從之」的態度，似乎反而不及當地官紳來得積極主動。「及《湘報》與學堂所論有瑕疵」，陳氏「遏其漸，剖析而更張之」。「遏其漸」三字既生動刻畫陳氏對於過份激進的維新主張的制約，也曲折表明當時湖南維新陣營並非鐵板一塊。實際上，由於社會角色與立場的差異，在同樣趨新的思想光譜上，陳寶箴與康有為、梁啟超，與譚嗣同、唐才常，與易孺、樊鍾諸人，仍有着深淺不一的顏色。范當世說得明快：「吾未見其為誰氏黨也。」（頁8）

范當世在陳寶箴墓誌銘中的表態，或許有事後刻意回護陳氏的意圖，但至少從「目公以康黨」和「吾未見其為誰氏黨」兩造之間，可見時

「康黨」一語作為刻畫新派人物的關鍵詞頻頻出現，是值得注意的時代現象。然而，被世人「目為康黨」的陳寶箴，卻不認為自己屬於「康黨」，反而着力劃清界限。

人心目中的新派形象及評價，差異確實頗大。戊戌變法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之後，陳寅恪在寫於1945年的〈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中，鄭重強調「戊戌當時言變法者」源頭有二，未可混為一論：源頭一是康有為以今文經學入手，通過「公羊三世說」，「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源頭二則是「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同樣是主張變法，陳氏一系的思想顯然源自後者。所以，當陳寶箴、陳三立看到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中駁斥康有為的《公羊春秋》，「深以為然」。實際上，陳寅恪亦藉此表明心迹：「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sup>⑮</sup>他後來也數次強調自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sup>⑯</sup>。這一「夫子自道」明顯更靠近張之洞「中體西用」式漸進調適的變革主張，而有意和康有為「孔子改制」式的激進路線一別苗頭。

不過，陳寅恪的上述看法也多少不免「後見之明」。實際上，當時人對於陳寶箴式的「新派」的看法，遠不止「二源」分流，反而呈現「多源」匯流的局面——有人視其為「康黨」，有人看不出是「誰氏黨」，甚至還有人將其目為「舊派」。范當世回憶：「許公不言維新者，方裁缺欲歸，公詒書督勸甚摯。許公曰：『豈須我耶？』余曰：『不然，此公義相取，陳公何必舊，公又何必新耶？』」（頁8）當「公義」作為「變法維新」的代名詞，意味着「變革」理念已成為當日影響士人的一大思潮。而「公義相取」之下「何必舊」與「何必新」的依違兩可，則最

能看出當時新舊翻覆的時代特徵。知父莫若子，難怪同為湖南維新運動中心人物的陳三立如此評價其父陳寶箴：「府君獨知時變所當為而已，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頁12）

### 三 「新派」分野：公私 關聯與滿漢互動

其實，後來的主流歷史論述對於維新人士的讚譽和變法事業的美好想像，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簡化了戊戌年間豐富多元的士人心態。從《年譜長編》裏陳寶箴父子與新舊人物的交往細節之中，實可一探維新進程中不同時期的新派分野與新舊之間的複雜關係。

湖南時務學堂創辦之初，黃遵憲向陳寶箴推薦康有為來此主講。陳三立隨即表示，曾讀過梁啟超的文章，「其所論說似勝於其師，不如捨康而聘梁」<sup>⑰</sup>，陳寶箴允之。結合陳寅恪後來對於維新變法的「二源說」，頗可再思當時維新人物對於康梁師徒的不同看法，以及知識群體乃至士人個性對於維新思想的外緣影響。後來成為語言文字學家的楊樹達，當年正在時務學堂讀書。在其所著《積微翁回憶錄》中，他寫道，當日第一班考入四十人，後來鼎鼎有名的蔡鐸高中第二名，成為梁啟超的受業弟子<sup>⑱</sup>。有趣的是，當事人陳三立在若干年後與梁啟超共話戊戌之時，對蔡鐸考取時務學堂的印象卻並不見佳：「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余因其稚特錄之。」（頁13）高中第二名者竟是

時人對於陳寶箴式的「新派」的看法，遠不止「二源」分流，反而呈現「多源」匯流的局面——有人視其為「康黨」，有人看不出是「誰氏黨」，甚至還有人將其目為「舊派」。「何必舊」與「何必新」的依違兩可，最能看出時代特徵。

戊戌維新之際，新舊之間錯綜複雜的公私關聯和滿漢互動，實非「新舊之爭」、「滿漢之爭」所能概括，而是包含了新舊之間不同政治力量，在現實利益與國家遠景之下彼此角力也彼此妥協的多重內容。

「文不通」，則時務學堂當日學生水平或許不宜高估。而對於同為新派的譚嗣同，周善培在《舊雨鴻爪》中曾回憶，陳寶箴認為譚嗣同「才不能勝氣」，稱其「才氣可愛，意氣可憂」。陳氏要周見到譚之時，勸他「作大事的人氣要靜」（頁42）。周進京前夕，陳氏託他捎話給劉光第，表示劉「沉着穩重」、「希望很大」，而譚「希望很大，憂慮也很多」（頁43）。從《年譜長編》所載這類時人描述的瑣碎細節之中，今人或許能看到康有為、梁啟超、蔡鍔、譚嗣同乃至湖南維新運動更加多元的面向。

另一方面，1890年代湖南的維新運動，也並非維新派隻手擎天、單兵突進。新派和舊派，特別是和滿人親貴如榮祿之間的密切互動，同樣不容忽視。陳寅恪在〈戊戌政變與先祖先君之關係〉一文中，明確談到榮祿對其父祖輩的推重。也正因為「南皮〔張之洞〕與榮祿本無交誼，而先祖與榮祿的關係，則不相同也」，所以「先祖之意，欲通過榮祿，勸引那拉后亦贊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為那拉后所喜之張南皮入軍機」（頁43）。陳寶箴當日此舉，可謂寄意遙深。實際上，觀察此一時期歷史需要注意的是，在維新運動相當長的時段裏，帝后之間並不完全是保守與維新的關係。一般被視為「保守」的慈禧派系當中，李鴻章、榮祿諸人的維新理念與實際動員能力，不在帝黨代表翁同龢等人之下。且雙方的激烈對峙，當是進入1898年之後的事情。《年譜長編》記載，戊戌政變之後，陳寶箴父子「止於革職永不敘用之薄

懲，實由榮祿及王元和〔卞僧慧按：王元和為王仁和，即王文韶〕碰頭乞請所致也」（頁44）。可見，戊戌維新之際，新舊之間錯綜複雜的公私關聯和滿漢互動，實非後人「新舊之爭」、「滿漢之爭」等簡單斷語所能概括，而是包含了新舊之間不同政治力量，在現實利益與國家遠景之下彼此角力也彼此妥協的多重內容。

#### 四 「遺民」之爭：政治 「理想」與國家「現實」

1898年9月，戊戌政變爆發，湖南乃至全國的變法維新亦隨之轉入低潮。之後的情形，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言：「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sup>⑩</sup>然而，直到進入民國，圍繞當日維新派的餘音仍嫋嫋不絕，但論辯焦點則由「康黨」轉而變成「遺民」。史學家吳宗慈為陳三立撰寫傳略，稱陳氏「出處大節」，是「自守為子為臣之本分」，認為陳氏「在清末季，韜晦不出，與辛亥革命後之作遺民，其志趣節操，乃一貫而行者」（頁15）。況且，「梨洲、炎武、船山諸賢，皆遺民也。雖古今情事不同，此名詞似亦不違其志者」（頁17）。然而，植物學家胡先驌讀罷，認為吳宗慈所謂「甘隱淪為遺民以終老」（頁16）一說，違背了陳三立的本意。在胡看來，陳氏之所以不願在民國政府出任要職，其實出於對民初南北政局「紊亂窳敗」的痛心疾

首，「與一般之所謂遺民者有異，且亦非甘於效忠清室者」（頁17）。

僅僅十餘年過去，昔日力主變法的新派人物，竟已被後人視為「遺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的激變程度，可謂巨大。而當時人眼中對於「遺民」的理解，彷徨於新舊之間，其思想斷續則更值得玩味。吳宗慈回覆胡先驕所言，「在今日似難用理想而演繹其事實」（頁17），其實不妨視為吳、胡二人各執一端的理據。民國代清，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重大後果。以今日眼光來看，辛亥前後士人心目中的政治「理想」與國家「現實」，較之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所處明清易代之際，內容其實已經大變。然而，陳三立式的「老人愛國，出於衷誠」（吳宗慈語，頁17），則意味着無論身處帝制還是共和，傳統讀書人對於國家權威的認同，仍有着抽象意義上一以貫之的價值。清代的普世王權業已崩潰，而新生民國「紊亂窳敗」卻又不容樂觀，兩者的深層內涵都指向文化理想中的權威失墮。現實雖然是一舊一新，但新舊之間其實質卻具有同構性——所謂「情事不同」，卻「不違其志」。因此，《年譜長編》中陳三立的態度，雖出於意料之外，其實正在情理之中，反而更見戊戌一代士人的個性：「忠於清，不必如鄭孝胥；贊成民國，更不必如譚延闓。」（頁15）陳三立不滿國民政府要員，故連同兒子陳登恪與譚延闓女兒的婚姻也一併否定。然而，他又直斥鄭孝胥「非忠於清，直以清裔為傀儡，而自圖功利」（頁17），進而相信「關民國

事，聽兒輩為之」（頁16）。可以說，陳氏的言行，有傳統中國易代之際「遺民」的內容，又確非「遺民」二字的舊義所能涵蓋，反而呈現更加耐人尋味的深意。

## 五 結語

晚清中國士紳階層與政治權力的二元結構，一方面基於國家的現實危機與實際利益，聯手催生維新思想與變革行動，但另一方面傳統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的影響，也讓那一時期的湖南地方士紳，傾向於壓制開明官員與知識份子的地方自治傾向與激烈言行。1898年初，當陳寶箴奏請焚燬《孔子改制考》，湖南維新陷入低潮。然而，此時京城變法反而在新的外緣刺激之下進入高潮，實出乎當事人意表。可見，在一激變時代裏，改革的時機把握與力度拿捏，並非易事。《年譜長編》以史料彙編的方式，勾勒出譜主陳寅恪的人生履迹，以及陳氏一生中透射出的十九、二十世紀風雲變幻。全書關切焦點雖然只是「一人一事」，實則透過紛紜史料足以讓後世讀者「知人論世」。

回到本文議題，無論戊戌、辛亥，還是之後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運動，實非後人想像與意圖裁剪之下形成的思想「單向道」，而是亮點與盲區並存，前進與後退交織。平心靜氣讀史閱世，方能真切體味變革時代的人與事往往有着西人所謂“dominated by none, but shaped by all”（不由任何人、事、物單獨決定，而是被多元因素共同形塑）的

清代的普世王權業已崩潰，新生民國「紊亂窳敗」卻又不容樂觀，兩者的深層內涵都指向文化理想中的權威失墮。現實雖然是一舊一新，但新舊之間其實質卻具有同構性。

複雜進程。正是這些多元互動的聲音此起彼伏、相互辯論，近代中國的歷史才一次又一次地呈現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的面貌。

### 註譯

①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 汪榮祖即在《年譜長編》的書評中指出，編纂者未取用陳三立致譚獻函，因此相關史事繫年有誤。又，《年譜長編》未列第一部陳傳（《史家陳寅恪傳》）於1976年在香港出版事。汪榮祖書評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70期，頁219-21。

③ 吳學昭整理註釋：《吳宓日記（1925-1927）》，第三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03。

④ 朱洪斌：〈《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一處小誤〉，《文匯讀書週報》（日期不詳）。

⑤ 參見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313-82。

⑥⑬ 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黃福慶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192-236；194-95、199、215、223-24。

⑦ 湯志鈞編著：《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61）；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中譯本參見周錫瑞著，楊慎之譯：《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北京：中華書局，1982〕）；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羅志田：〈近代湖南區域文化與戊戌新舊之爭〉，《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頁53-83；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店，2005）；《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⑧⑩ 熊希齡：〈上陳右銘中丞書〉，轉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57。

⑨ 狄葆賢：〈任公先生事略〉，轉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頁58。

⑪⑫ 梁啟超：〈時務學堂札記殘卷序〉，轉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頁55。

⑭ 參見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戊戌政變與先祖先君之關係〉，載《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04。

⑮⑰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載《寒柳堂集》，頁167、168；167。

⑯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85。

⑱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4-5。

⑲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82。